



英倫漫話 江恆

聖誕節來臨，英國的傳統慶祝活動花樣繁多，包括互送聖誕卡、給聖誕老人寫信以及聽王室聖誕演講等等，而開創這些活動歷史先河的過程更加精彩。如今交換賀卡互致問候幾乎成了聖誕節的代名詞，可它的誕生卻相當偶然。第一張有記錄的聖誕卡出現在一六一一年，由德國醫生邁克爾·邁爾寄給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兒子威爾士親王，內容大意是：「在此神聖的日子，謹向最受尊敬的國王致以問候，我們進入了新的吉祥年。」儘管卡片富有創意，卻未流行起來，直到一八四三年，才被亨利·科爾爵士真正發揚光大，他時任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首任館長，也是便士郵政系統的發明者。由於當時阿爾伯特親王提出了裝飾聖誕樹的想法，而狄更斯出版的《聖誕頌歌》讓聖誕節變得流行，這些都為聖誕卡問世創造了條件。英國作家比爾·布萊森在《趣味生活簡史》一書中寫到聖誕卡誕生過程，科爾全家在聖誕節前特別忙碌，有成堆節日信件需要回覆，可是時間已來不及了。於是他想到用卡片送祝福，並親手繪製了充滿歡樂氣氛的畫面——全家人圍坐在桌子旁吃大餐，卡片上還印有「祝您聖誕快樂，新年愉快」的

聖誕先鋒

字句。作為聖誕卡的原型，可以看出，它傳遞的是歡樂和慶祝，並沒有宗教色彩，這也是早期英國聖誕卡的设计風格，即大部分圍繞浪漫的鮮花或仙女，有幽默感或溫馨的兒童及動物插圖，以及描繪中產階級飲酒、跳舞和慶祝等歡慶場面，這些元素直到二十世紀仍很流行。不過，科爾設計的聖誕卡最初印量不大，僅有一千張左右，因沒有彩色印刷，他需要逐張精心手繪，導致價格比較昂貴。科爾的第一張聖誕卡以一先令的價格售出（當時一先令能買一隻大鵝），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難以接受。儘管如此，聖誕卡的想法得到認可，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隨着印刷和出版技術的進步，平版印刷商能夠為每個人批量生產價格實惠的聖誕卡，於是從聖誕節至新年前夕互贈聖誕卡在歐洲蔚然成風，隨後這個習俗開始傳遍世界。在此基礎上，英國又衍生出聖誕循環信(Round-robin)習俗，即附帶聖誕卡寄送給多位親朋好友，告訴別人你一年來所做的事，一度非常流行。但時間長了，人們不免审美疲勞，加上此類信件過於公式化並有自吹自擂之嫌而遭到冷落。有

趣的是，近年來聖誕循環信又有東山再起之勢，據英國賀卡協會(GCA)統計，去年聖誕節期間英國人總共發送了一點五億張聖誕卡，每人平均發送和接收十七張，很多以聖誕循環信形式寄出，千禧一代更是主力軍。正如作家西蒙·霍加特在暢銷書《能打開冰箱的貓》中所說，聖誕循環信有助人們在現代生活中重塑人際關係。給聖誕老人寫信則是聖誕節的另一個傳統。在英國，寫給聖誕老人的第一封信出現在一八九五年，是一位來自窮人家的小女孩索要繪畫顏料作為聖誕禮物，而該信是兩年前在林肯郡一家報館的檔案中被發現的。在這封寫給「北極聖誕老人」的信件中，女孩形容自己的父親死於天花，母親甚至無力為她購買課本，而獲得繪畫顏料是她的聖誕願望。據收藏該信的倫敦郵政博物館披露，故事有個美好結局，當時郵局的人看到信件並被誠懇的內容打動，於是大伙集資購買了繪畫顏料，並以聖誕老人的名義交給了女孩。無獨有偶，史料記載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一名年輕女孩給聖誕老人寫信，但她沒有要求收穫玩具和糖果，而是希望給家人提供衣服和

幫助，尤其是懇求可否為自己的父親買一些沒有洞的襪子作為聖誕節禮物。另外，據上世紀的《哨兵晚報》記載，一九七六年有位來自倫敦的七歲海倫，她在給聖誕老人寫的信中聲稱，不會在平安夜給聖誕老人留下威士忌，以確保他不會酒後駕駛雪橇，字裏行間充滿童趣。至於英國每年一度的王室聖誕演講，背後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上世紀二十年代廣播日益成為君主與民眾對話的媒介，新成立的BBC寫信邀請英王喬治六世在聖誕節節日向民眾講話，但他因患口吃予以拒絕。二〇一〇年上映的電影《國王的演講》，刻畫了喬治六世口吃的經歷，這令他接連在大型儀式上丟醜。當工黨首相麥克唐納上台後，緩解了國王對個人廣播的擔憂，並請來作家吉卜林撰寫演講稿，最終促成喬治六世走進播音室。歷史學家馬修·格倫克羅斯在《溫莎王朝》一書中描寫了當時的細節：演講是在桑德林漢姆宮樓梯下的包廂裏進行的，官方設置了迷你工作室，桌上鋪着厚厚的布，國王非常緊張，他的雙手顫抖，導致講稿發出沙沙聲流入麥克風。這個由喬治六世在一九三二年開創的傳統，至今已持續了九十二年。不過，如同肯尼思·羅斯等歷史學家所說，國王聖誕演講受到好評，很大程度歸功於吉卜林的文筆，此後的王室聖誕演講不再由他這樣的作家撰寫，是一種損失。

有一片藍



黛西札記 李夢

上周五去深圳，參加每年一度「深圳十大佳著」頒獎典禮。這項評選活動至今已舉辦十一屆，每屆選出深圳本地作家創作的十本好書，為深圳文學創作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熱愛寫作的市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分享與對話平台。活動承辦方深圳市福田區圖書館的劉濤館長對我說，此前頒獎典禮通常在深圳中心書城舉行，今年舉辦地點特意選在福田區景蜜公園內一處別具特色的閱讀文化空間「藍書坊」。藍書坊是深圳首個以城市建築文化為主題的新型文化空間，今年八月入選「廣東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間」。顧名思義，藍書坊的建築外牆是大片的藍，坐落在綠樹草地鳥鳴花香的社區公園一角，甚是醒目。館內除有文獻閱讀區、文創展示區之外，還有深港雙年建築展陳設區，以及「書語咖啡」入駐。有

別於傳統的圖書館，「藍書坊」建築整體頗富設計感，空間靈活多變，可因應不同活動主題及內容呈現不同氛圍。館內採光尤其好，實因屋頂處闢有一扇圓形大窗，時見陽光燦爛，或聽雨滴敲打，與四季四時諧和呼應。頒獎典禮舉辦那日，正是晴朗無雲的天氣。舞台正設在那圓窗之下，陽光落下來，落在書頁間，真真美景。頒獎儀式上，除了得獎者上台領取獎狀、發表感言之外，還有一個別致的「書香傳遞」環節。今年入選「十大佳著」的作品，分別贈送給深圳及香港的書店代表。稍後，這十本好書將在香港的書店展出，與香港市民及外地遊客分享深圳文學創作的當下風貌。深港共讀近年備受關注，兩地出版文化界攜手舉辦了一系列豐富多元且具影響力的特色活動，兩地青年創作人的交流和往來亦日漸增多。不論深圳社區公園內的藍書坊，抑或香港多區的特色書店，都可作為兩地文學青年對話互動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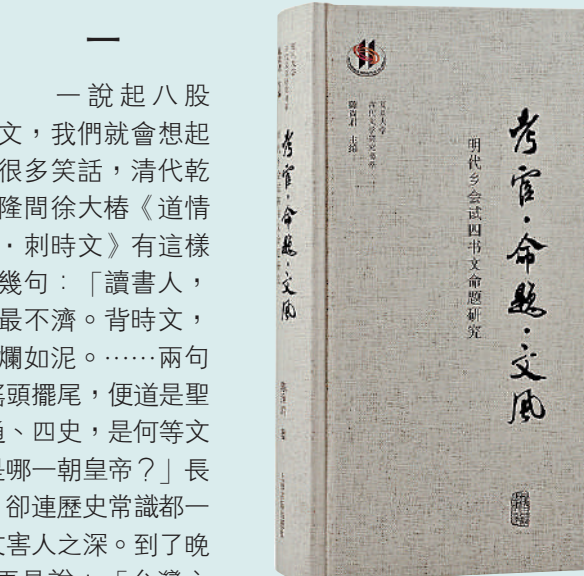
在文化生態中審視八股文

——評陳維昭新著《考官·命題·文風：明代鄉會試四書文命題研究》



燈下集 韓問

一 一說起八股文，我們就會想起很多笑話，清代乾隆間徐大椿《道情·刺時文》有這樣幾句：「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兩句破題，三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長年累月寫八股文，卻連歷史常識都一無所知，可知八股文害人深。到了晚清的時候，康有為更是說：「台灣之割，二萬萬之賠款，琉球、安南、緬甸、朝鮮之棄，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輸與人，國之弱，民之貧，皆由八股害之。」（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一種考試的文體竟然會導致國弱民貧的惡果！



▲陳維昭著《考官·命題·文風：明代鄉會試四書文命題研究》。

化關聯，客觀冷靜地呈現八股文的種種面相，把歷史辨析與文本分析相結合，在豐富的文獻論證和深入的義理探討中還原八股文的歷史真相。二 陳著的第一個特點是，把八股文放在經學流變歷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因為八股文的義理基礎是經學，經學的發展變化導致了八股文風隨之而變。按明初官方功令，八股文應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標準去闡發經義，但是，明嘉靖以後，隨着陽明心學和禪學的盛行，八股文寫作出現了新的變化，陳著指出，焦竑《四書講錄》、袁黃《四書問正》均以陽明學釋四書，湯顯祖、楊起元以禪學寫八股文，引發晚明數十年八股文的新面貌。在梳理明代八股文流變的過程中，陳著引入一個重要的參數——考官。科舉考試雖為朝廷所推行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文體雖由朝廷規定以程朱一派的理學思想為旨歸，但是，執行命題、衡文、取士職能的則是考官，而考官在此過程中具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權，這使得考官成為八股文風發生變化的最重要變數。陳著緊緊抓住「考官命題」這一關鍵性環節，指出八股文題目的形態及

其變化，直接導致八股文風的變化，比如晚明載題的出現，催生了「鈞、波、挽、掙」修辭手法的普遍流行，由此形成重「機趣」、重「機局」的八股文寫作理念。三 正因為考官命題在八股文體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具有如此直接而重要的作用，陳著以「命題」為原發點，上溯明代考官的聘任制度和閱卷制度，考察考官所處的政治文化生態，尤其是考察八股文命題與考官的政治文化生態的關係，由此彰顯八股文命題在文化中的開放性功能。四 陳維昭教授長期從事科學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對搜集到的二千四百一十八道明代鄉會試的四書文題目進行辨析、歸類，從而形成對經學史、科舉史、八股文史的一系列論斷。譬如通過考察明代鄉會試四書文題目在四書上的分布情況，陳著指出，儘管四書只有區區五萬字，但明代鄉會試的四書文題目並未覆蓋四書的全部文字，而是集中於四書中義理冠冕的部分，這就說明，明代並未出現「題庫危機」，載題的出現有其更為深刻的原因。又如，陳著指出明代八股文在小結之後還有一個大結，可以表達士子對儒家經典的個人見解，內容涉及政治、軍事、財政等等，可見明代八股文在思想表達上具備了「自據己見」的文體功能。陳維昭於日本蓬左文庫所發現的兩種科舉文獻《四書程墨清商》與《四書傳世輝珍》成為這一獨到見解的文獻基礎。清代方苞《欽定四書文》所選入明代八股文絕大多數已刪去大結，方苞此書已不是明代八股文的原貌。以文獻為基礎，以命題為原點，陳著由此上溯考官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生態、考官個人趣味，下推明代鄉會試歷科文風之變，從而充分呈現明代八股文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由此為讀者呈現了八股文的種種真實的面相，從而有助於我們真實而深刻地了解八股文以及與八股文那段歷史相關的考試制度、文人心態、文章風貌。

與「明星」合影



市井萬象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位於太平山頂凌霄閣，專門展覽名人蠟像，包括世界各地名人及知名影星、音樂人、體壇健將等百餘尊蠟像，吸引不少內地遊客前來打卡。中通社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陳寅恪

陳寅恪十三歲隨兄陳衡恪（師曾）遊學日本，後就讀於美英法德多年，曾入哈佛大學和柏林大學，是公認的讀書種子，留學十幾年而不讀任何學位，志在史學。為了能閱讀更多的史料而掌握了十幾種語言，特別是英德法俄日等之外的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回鶻文、西夏文、吐火羅文、波斯文、佉盧文、希伯來文、印地文等鮮有人懂的文字。他自己說「思想囿於成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贊成所謂「中體西用」。「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意思說自己年輕時喜歡王安石的變法，老了以後認同張之洞的保守主張。陳寅恪專治中國中古史，以隋唐為主，上及魏晉南北朝，下達兩宋，他認為文化「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

經濟制度尤其重要者。」《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是他的三部史學專著，也是中古史研究的必讀書。對思想史和學術史他著墨不多，但見解獨特，對韓愈的看法就是一例，陳寅恪認為韓愈《原道》為「吾國文化史中最有關係之文字」，韓愈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闢振點之人物」。他還認為古文運動興起，帶動了唐代小說（傳奇）之蓬勃。正統當中也蘊含着真知識和真信仰，陳寅恪視韓愈為宋明理學的先導，新儒學的開山。他對於宋代的文明極為推崇，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日本的宮崎市定將宋代視作中國的文藝復興，與中國印刷術在宋代的普及密不可分。「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之Idea者。」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所殉之道，正是此一文化理念。在《清華大學王觀堂紀念碑銘》中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語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在陳寅恪看來，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在根本上與中國文化的理想境界並不矛盾。作為同光詩壇領袖陳散原之子，陳寅恪的古詩創作持續其一生，惜留存甚少。他未嘗以詩人自居，每每以作詩記錄其生平之事。「名山金匱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千秋有命存殘稿，六載無端詠舊

題。」「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負他生。」「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陳寅恪的詩中，不僅使用大量「古典」，也暗藏不可勝數的「今典」，「涕泣對牛衣，卮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這是他晚年身處絕境，寫給夫人的一幅聯語。《紅樓夢》是近代三百年間中國人以漢語鑄就的最偉大作品之一，同樣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也許是另一部《紅樓夢》。明末清初詩人錢謙益生前曾希望「得一明眼人」註其詩，方能「發皇心曲」。他未能料想三百年後失明的學者，耗費十年鉤沉其姻緣，著就奇書，這也算是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交往的奇跡，是文本的增值。個人的閱讀活動永遠在溝通文字世界與非文字世界，而一切始於閱讀活動的創作，不僅改變着投身其中的人，也一次又一次地擴大了文字世界的疆域。（二十三）